

v31

D-99

(7)

1996年第1輯

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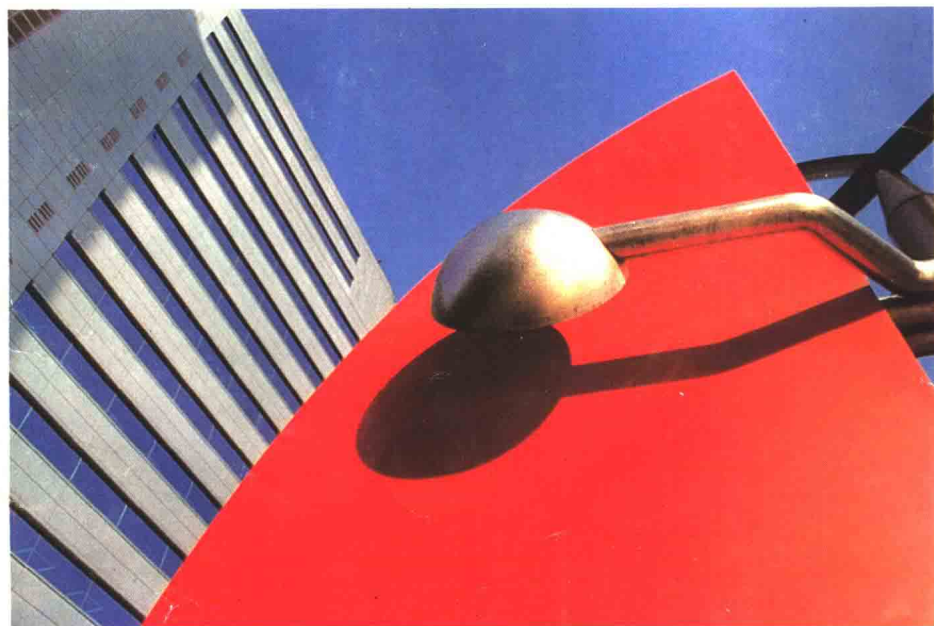
西南边陲禁枪之战

足球帝国意大利

包玉刚和他的四个女婿

雀巢公司的名牌战略

我的丈夫柏杨



READER'S REFERENCE DIGEST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分配关系不顺是当前物价
腾升的主要原因
- 7 货是假, 祸是真

天下事

- 15 “外保”频叩中国大门
- 18 亚洲大趋势

社会广角

- 22 西南边陲禁枪之战
- 27 城市、住宅的理想与现实
- 29 夜总会向何处去?
- 33 疲沓的禁烟运动
- 34 贪官档案

人物

- 35 加利: 从金字塔下走来的
“世界总理”
- 41 阿基诺夫人的平民生活
- 43 我的丈夫柏杨
- 45 霍金: 揭示宇宙奥秘的轮
椅天才
- 48 包玉刚和他的四个女婿
- 49 伟人最后的朴实

婚恋与家庭

- 50 爱情的力量有多大?
- 55 对爱不再怀疑
- 58 现代多恋症
- 61 金钱与名位的联姻

- 65 变异中的美国家庭
- 69 钱: 男人女人谁更潇洒
- 72 欧洲婚俗拾趣

经济生活

- 73 连锁经营与CI
- 74 雀巢公司的名牌战略
- 78 国库券与市场规范
- 82 人生忠告: 不要穿名牌
- 83 家庭投资的忌讳
- 85 工资一年知多少
- 85 我的炒股经
- 86 礼仪消费

文化广场

- 87 北京, 文化个体户的沃土
- 91 我国电影的“卖点”在哪
里?
- 92 如果没有激情, 我就不拍
电影
——姜文访谈录
- 95 马可·波罗未到中国, 著
名游记抄袭而成

随感录

- 96 有感于“负文化”
- 97 对价格太计较, 对价值太
轻视
- 98 追求普通人的生活
- 99 救救富人

100 没有青春

101 真话与假话

中外书摘

102 浪迹天涯

教育园地

105 世界著名科学家父母的
教子艺术

109 教养加聪明等于成功

110 诞生高智商孩子的家庭

111 期望是一份无限的动力

111 美国的天才儿童教育

113 STS:科学教育的新概念

113 校园十大怪

体坛纵横

115 足球帝国意大利

119 有氧运动健脑益智

科技动态

121 遗传基因重组技术将引
发一场绿色革命

121 爱因斯坦预言被证实
美研制出超三态物质

122 大陆漂移学说起于“诗
人”的梦幻

123 日一科学家认为15年内
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

123 物种灭绝被夸大了

自然与人

125 水,最紧缺的自然资源

127 南极上空臭氧层缘何最

先遭破坏

128 森林:人类永恒的福星

129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改革与国情

6 我国轿车产量10年增长50
倍

14 洋货市场占有率过高

26 “南粮北调”宣告结束

28 企业房改开始试点

32 我国经济将出现十大趋势

42 市场化不是教育改革的出
路

49 我国一些基础性商品价格
过高

64 特区由“优惠型”转向“功
能型”

71 解决企业离退人员待遇过
低的思路

九州方圆

130 京九沿线:最具活力的
经济增长带

131 从京津互动到京津互助

132 北京旅游新热门:逛名
牌大学

133 北京人感觉错位

133 青岛农民自费办公园

134 南京百姓向银行借钱花

134 上海外滩将重建金融区

134 渤海中部发现亿吨级大

油田

港澳台之窗

- 135 香港的世界之冠
137 香港人怎样掏腰包
140 台湾行
141 台湾种种
142 港人生活内地化
142 台湾将承认大陆大学学历
143 两大因素影响澳门经济

世界博览

- 144 拍卖人的摇篮——密苏里拍卖学校
148 今日丹麦人
151 澳洲最欧化的城市：墨

尔本

- 153 韩国：财产公开防止腐败
155 欧洲的多国部队
156 欧洲人青睐自行车
157 月子里的德国女人

健康咨询

- 158 百病之源话疲劳
158 生活无规律的人怎样睡好觉
159 吃饭防噎，行路防跌
159 朝朝盐汤，晚晚蜜水
160 日本“三低晚餐”
160 中老年人应重视 TIA

补白

- 54 生日蜡烛为何要吹灭？
68 革命、女人和书
108 最干净的钞票
-

《读者参考》1996年第1辑(7)

1996年2月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金辉 洋叶

封面设计：耿泓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20001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邮政编码：20002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万

ISBN7-80616-177-5/Z·10

定价：4.80元

分配关系不顺 是当前物价腾升的主要原因

刘福垣

当前物价腾升,社会反映强烈,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认真分析其原因。只有找准当前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不然,就会白费劲,甚至适得其反。

这次连续近一年的物价上升,是在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有剩余的条件下降发生的。所以物价上升既不是通胀政策的产物,也不是需求拉动。它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

我认为,这次零售物价腾升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关系不顺引发收入攀比心理导致的流通领域行业性人为提价。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采取多领域、多层次、双轨制方式进行的。双轨制的优点是逐步放开,易于稳定大局。它的弊端是在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人们的机遇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核心问题是对生产资料、资金等要素的占用机会不公平。少数人利用双轨制占据了各行各业的“制高点”,靠权力,靠近水楼台,靠优势产业、优势行业,靠占用优

质、优势生产资料,靠占用大大超过平均占用水平的生产资料,短时间内取得了大大超过平均水平的收入。更有少数人钻改革的空子,利用法律不健全,巧取豪夺,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一般公众认为这些人富得太容易,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不是靠自己的忠实劳动,也不是靠自己的生产资料致富,而是利用改革机会,靠国有资产流失致富,因而人们心理感到极大不平衡。改革以来,虽然大家普遍得到好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了提高,但难以容忍少数人这样取得财产的既成事实。少数人由于钱来得容易,所以花得也痛快。一时间高消费势头凶猛,对此,各种报纸已多有披露。什么歌舞厅、卡拉OK厅、高尔夫球场的普及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一些落后地区,城市建设还没个模样,高档KTV已赫然立在那里。对于这些,工薪阶层、小本生意人是不敢问津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其他人谁不想富?怎么追上去?于是,各想各的路,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行各业都在想自己的生财之道。

走在前面的是为高收入高消费者提供劳务、供应消费品的第三产业的部分经营者。他们目睹高消费最直接，感触自然不同一般。他们千方百计提高劳务价格、经营的商品价格。一瓶果茶的出厂价不到2元，到了KTV厅至少10元，高的卖到二三十元。这些人也由于为高收入、高消费者服务而获得高出一般市民的收入水平，他们的月收入达1000至3000元。

于是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成为大城市里令人羡慕的职业。这部分人的收入多了，消费水平也就高起来了，出手也比一般市民大方得多。这些人的数量要比大款、大腕们多出许多倍，辐射作用自然更大。

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个体经营户。他们心里也有一本帐。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险，住房、就医都要自己解决。根据目前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一天下来他们如不捞个百八十元就感到亏了。例如早市上的个体菜贩，在北京大钟寺批发的黄瓜是4角钱1斤，按常理零卖六七角就算不错的盈利了，可他非要卖到8角、1元甚至1元2角。他凌晨四五点钟去批菜，早市两个钟点，他要挣100元。如能卖250斤黄瓜，每斤必须净挣4角，黄瓜价就卖到8角以上。这样他1个月至少要收入3000元。3000元收入高吗？对公职人员来说，这是高收入了，但菜贩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会说，他没有公家住房，他要租到一般干部两居

室的住房得要多少钱？没有300元、500元是不行的。虽然他现在没有住上这么贵的房子，但这笔钱得考虑在应得收入之内。他还会说，他没有公费医疗，到医院去看一次感冒也得有八九十元，这不从菜价上找怎么行？大城市居民平均每月的生活费恐怕得200元，他要负担两个人，一个月没有500元也不行，剩下的还得防老、防天阴，一个月不收入3000元是不是亏了？他振振有词。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此下来，各行各业都在搞“堤内损失堤外补”，谁不想把自己能说了算的劳务和经营品价格往上提呢？于是用不着什么欺行霸市，各行各业都变着法把劲使到价格上。尽管人人都是消费者，都在吃涨价的亏，但正因为如此，人人都在自己经营的范围内为物价上涨出力。收入和消费的攀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一发不可收。物价就这样在需求拉动不大的情况下升上来了。薄利多销的概念早已淡化了。

作为买者，也不会花很多时间讨价还价，一看都是这个价就买几斤算了。现在人们对物价上涨已有些麻木，对东西贵已不感到可怕，怕的是挣不来钱，大家把劲都用在想法赚钱上。这是物价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买东西不用排长队，有钱什么都能买到，说明商品供求矛盾不是物价上升的主要支持因素，根

本的原因是收入的攀比心理。

最后，不应忘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我们生产最基本生存资料的农民们，他们虽然在改革中受益匪浅，但他们的收入与高收入者相比差距最大，心理更是不平衡，尤其是种粮食的农民。

农民并不都懂得价值形成和实现的规律，但是他们作为共和国的主人之一，国有资产有他们一份，他们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险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一点他们是深有感触的。他们并不都清楚他们收入低的原因是占用的生产资料少，就业不充分，可他们习惯用自己的年收入和城里人比。

近些年来，农民的收入和城里人明显拉大了。他们有了电视机，虽然多数还是黑白的，但通过这个现代信息工具，知道城里发生了什

么样的变化，特别是电视镜头中展现在城里的“花花世界”。这里超高级、超豪华的吃、穿、用、行，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一部分农民不安于土里刨食吃，不安于低收入，从偏僻的乡村来繁华的大城市，对城市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加大了心理的不平衡。他们手里能和社会交换的，就是粮食、肉、蛋、油，还有自身的劳动力。他们不知道什么成本利润率高低，只知道他一年的收入不该比城里人低。

总之，由于大的分配关系不顺，出现变相人为提价现象。从理论上说，这次物价腾升是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引起的，要从劳动力就业角度，从生产资料分配，从产权，从个人所得税方面着力才能解决。

（摘自《大地》）

我国轿车产量 10 年增长 50 倍

1985 年，我国生产轿车 5207 辆，在汽车总产量中的比重为 1.2%。80 年代、90 年代交替之际，中国轿车年产量连续 4 年翻番或接近翻番：1989 年 2.9 万辆，1992 年上升到 16.2 万辆。1994 年，轿车产量为 25.51 万辆，在汽车总产量中的比重已超过 18%。拿 1994 年同 1985 年相比，轿车年产量已增为 49

倍，在总产量中的比重已增为 15 倍！

1995 年国家计划安排生产轿车 35 万辆，而汽车市场专家们认为实际运行结果可望接近 40 万辆。将这一年可望达到的轿车产量同 10 年前比一下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增长超过 70 倍已不成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

货是假

祸是真

赵牧



1994年4月，湖南岳阳市福利院的9名孤儿死了。死因是吃了一种霉变的米粉，生产者长沙巴王堆乡火炬村的一个农民，而福利院购进这种米粉的理由是便宜。婴儿本能地拒吃，保育员却硬是塞进婴儿的嘴里……

中国的假祸狂潮，从最早名闻全国的晋江假药案到“最新”这起岁末才被新闻界曝光的婴儿死亡案已达10年之久，其势头似乎有增无减，日益泛滥。

假冒伪劣“满视野”

“你们猜猜，在我的家乡梅县，一个小小的县城有多少家店铺在销售假冒的金利来产品？——600多家！”

1991年6月2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查处侵权假冒商标案件新闻发布会”。曾宪梓到会发言：“我痛心作为一个中国名牌的创造者，在自己的祖国受到这样的伤害！我痛心消费者受到欺骗，国家的法律受到藐视！更痛心我们的国家形象受到玷污。一个假货充斥的国家难道是光荣的吗？”

早在80年代初上海公演的一部纪实性戏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一瓶作为请托工具的假茅台，在众人手里传来递去，终于在一个能拍板、因此也有权喝酒的某官手中现了原形。这对“喝酒的不买，买者不喝”的“不正”之风，无疑是个开心讽刺。

不过，理所当然的愤慨戏剧性地转化成“幽默”时，未必说明人们的潇洒，而更可能是茫然和无奈。

“满视野”——不知谁先使用这个生动术语来描述假祸泛滥之情形的。这并非艺术夸张，最富想象力的人怕也找不到比这更贴切的词来概括今天的现实。

在此不妨粗略划分和罗列一些常见的假冒伪劣现象：

一、信息类：假新闻，假广告，

假征婚广告，假物资交换信息……

二、身份类：假农民，假大学生，运动员，假先进，假华侨，假台胞，假军人，假警察，假学历，假学者，假领导，假公子哥儿……

三、票证类：假钞，假发票，假护照，假身份证，假火车票……

四、艺术类：假字画，盗版书，假古董，假义演，假导演，假剧组，伪名人，劣等星，假有奖征文……

五、商品类：几乎涉及所有有利可图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前者包括人们生活吃穿住行用所有方面，而后者可以大到是假汽车，伪劣机械……

六、事件类：假验资，假公证，假合同，假批文，假合资，假机构，假比赛，假结(离)婚，假学习班，假科研成果，假报关手续……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无所不在、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现象所困扰，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成为这种假祸的牺牲品。

另一种谋杀

没有这样的认识，假祸狂潮就别指望得到控制。

1988年上半年，各地查出低劣农药案100多起，郑州等地产的“化肥”使濮阳市4.5万亩麦田绝收。

1992年，山东发生假硫酸卡那霉素注射致人死亡案。卫生部药政局接到报告立即发出明传电报，让各地查封标有“上海海普药厂”批号

为920108的硫酸卡那霉素。这使所有标有920108的药无论真假都不能再用。接着，人们又发现先后有7名儿童死于假冒无锡第四制药厂的硫酸小诺霉素，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又下令封存所有这个批号的药品。结果，无锡第四制药厂损失惨重。

1990年9月20日，武进县刘良洪买了一只哈尔滨市益民汽化油炉厂生产的汽化油炉(可使用汽油)，充气加压时油炉底部爆裂，被严重烧伤，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1992年3月8日，宁夏银川市铁西商业联社德州扒鸡店生产的扒鸡因染有“鼠伤寒沙门氏菌”，使110人中毒。

1993年10月12日，四川什邡不法商贩刘邦云、黄开洪用工业酒精兑水假冒散装白酒出售，造成5人死亡、4人双目失明。

1993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在北京45家宾馆、饭店抽取全国名优白酒两种50瓶进行抽验，发现其中只有9瓶是真货，在天津、上海等10个城市抽查1500家单位的结果，发现60%是假酒。

哈尔滨农贸市场上的豆猪肉(即有猪囊虫的病猪肉)一度曾泛滥成灾。1985年我国取消生猪派购任务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农贸市场随时可买到新鲜肉。但随之而来的是个体屠宰户无法保证卫生条件，同时检疫、检查没有跟上，使病豆猪肉上市量增加。为此哈尔

滨市恢复国营一统天下，取缔所有集体个体屠宰点。但由于点少，肉贩宰猪不方便，干脆就私下偷杀，不检疫，不上税，直接流入市场。

1992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打假活动初获战果，查获假冒伪劣商品货值2.4亿元，罚款1200多万元。另据打假办介绍，各地已捣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黑窝点3899个，破获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团伙75个，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活动，立案6900起……

“初获战果”已然如此，若是“全歼”其数如何？

但问题的严重性正像1992年6月6日《新闻出版报》报道的那样：1991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国营、集体企业事业中假冒商标的直接责任人员，占立案总人数的21.5%，说明搞假冒的已不单是个体工商户。

假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直接意义上的谋财害命的行为。因此当它是一种有组织行为，甚至受到超越法律之上的力量保护时危害更大。

1990年，黑龙江省双城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以每公斤0.6元价格强行收购代畜主屠宰时发现的豆猪肉。然而他们自己却把囊虫猪肉写成“冷冻白条肉”，以每公斤2.08元出售。

1993年3月31日《中国化工报》报道：浙江嵊县甘霖镇“小仙生物

激素厂”擅自生产“溃疡灵”。该厂不仅没有依法办理“两证”，当事人丁小汕还两次写信恐吓揭露此事的记者。法院判丁败诉后，丁仍继续推销溃疡灵，甚至花钱拍了一部电影《植物营养素——溃疡灵》，并在甘霖镇举行首映式，还在县电视台上连续放映三天。甘霖镇的负责人说，丁小汕是为甘霖镇人民谋福利的，我们镇政府坚决支持，支持到底。

这就是人人皆知的假祸狂潮愈演愈烈的重大根源——“地方保护主义”。

在众多同类事件中，《中国经营报》(1991年10月29日)描述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

山东省利税大户兰陵美酒厂的产品近年大量被人假冒，有关部门先后查获假兰陵美酒20多万瓶，商标500多万枚，酒厂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久，苍山县执法机关发现了祸根所在：河南延津县城关镇西街农民潘振洲的“地下工厂”。

1991年4月24日，山东苍山县工商执法人员、公安局、检察院和兰陵酒厂技术鉴定人员组成的查案小组分乘两部警车，带上必要法律手续直奔延津县。

他们到达延津县后主动与当地公安部门联系，由该县城关派出所一名干警带领来到潘家。潘正在打麻将，于是执法人员强制将潘带上警车并进行搜查。搜查中发现了四部中型印刷机，一台切纸机，一台烫金机。房内还有兰陵大曲、二曲

及全国各大名酒商标印刷版和印制好的各种假商标……

这时，门外出现数百围观者，其中有人高喊：“把东西留下，不准这些人走！”苍山县执法人员感到情况不妙，忙让见证人在搜查清单上签了字，将部分印版和一些脏物装车。为防止发生意外，他们还决定让拉物证的警车直接开回苍山县，留下一部警车和部分人员办理拘传潘的手续。

果然，事情突变。县公安部门竟出面干预不让带走人犯，还有个别负责人训斥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有损公安干警形象。”“明天把你们全扣起来！”门外还聚集上百人，不少人喊着要打人、砸车。

苍山县一行人担心出事，希望留在县公安局办公室过夜，但遭到拒绝，只好到县服务公司招待所住下。陪同者告诫不要乱走，否则不能保证人身安全。这时楼下仍然聚集许多人，还有人往楼上扔瓶子。为防不测，他们商量弃车逃走，将暂时不用的东西留在旅馆，装成住下的样子。凌晨一点，他们潜出招待所，避开大道，摸黑在田野里落荒而逃，穿行3个多小时，他们才在远离延津县30多公里的地方上了公路，截乘一辆东风车向郑州而去。

5月9日，苍山县一行14人再赴延津，先到新乡市得到市政府和公安局的支持后，10日到达延津县。此时潘振洲已经逃走，在他家里又搜出大量假商标和36种印版70多

块，连兰陵酒厂花了100多万购买不到半年的“专利仿冒封口”也被仿制生产。潘在银行的3万多元存款在没有存折的情况下仍被支走……

面对连司法系统的人员都不能自保的事实，普通消费者如何指望在受害时讨回公道？

这种大规模造假行为，远非走街串巷收购名酒酒瓶造假酒所能比拟的。尤其是当它成为某地方局部利益的部分并受到当地权力机关保护时，它将导致的严重恶果不言自明。这种情形如果得不到扭转，假祸狂潮必与商品经济大潮同时看涨，最终摧毁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

历史能告诉什么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凡事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但面对商品社会的假祸狂潮似乎只好借鉴西方的历史。

果然有人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那里发现，假祸是商品社会初期的必然现象。那么就让我们先扫描一下当年英国的情况，

腊肠，英国人喜欢吃的食物之一。19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英国曼彻斯特城里就有数不清的大杂院，其典型的情形就是满院的垃圾、死水洼，没有门的厕所通常设在大杂院入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腊肠制造者就在这种臭气熏天的院子里就地盖起猪圈，就地饲养，就地屠宰，就地加工出大量的风味腊肠。

面包更是英国人的必需品。

1863年，社会公众对面包中掺假和面包工人对18小时以上的过度劳动反应强烈；为此英国政府任命原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委员特里门希尔为皇家调查专员，专门调查假面包。

商品社会出现假祸有其必然性。但历史如果仅能告诉人们，人类在历史上对自身犯下的所有种类的罪恶不但将在任何一个社会角落里重新上演，而且必然愈演愈烈，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可悲的结论：人不但在根本上缺乏预见性，缺乏防患未然的借鉴能力，而且是已经失去了动物自我保护本能的蠢货。

人类生存面临的危机是严重的，所以有些发达国家在为自己筑坝时，还想方设法把有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工业水平落后的国家。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国家甚至把别国当作堆放废料的“天然”垃圾场，并以高效化肥、原油、进口时装的名义向他国倾泻化工废料、核废料、肮脏的旧服装。

我们曾多次成为这种以邻为壑恶劣行径的受害者，但义愤之余令我们自己汗颜的却是，在我们自身生存的内部空间，假祸狂潮不但与商品经济的大潮同步看涨，而且也成为流溢国门之外的一股祸水。

俄罗斯的报纸上出现过这样一幅漫画，一个脚踩中国旅游鞋的俄罗斯人正迈过中俄边境，中国境内这只脚上的鞋崭新漂亮，出境的那

只却已皮开肉绽。

1993年2月18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专题报道了远东地区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情况，画面上成堆的毛毯带着虫蛀的大洞，皮茄克上涂满皮鞋油，水一冲立即褪色，一把折叠伞龙骨大多已经折断无法打开，每件伪劣商品上都醒目地打着“中国制造”的商标。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一位退休老太用积存半年的1.5万元卢布给儿子买了一件中国羽绒服，回到家一拍，满屋鸡毛乱飞。老太一气之下，叫来邻居，在大街上将其付之一炬。从此她见到中国人就伸出小拇指，高喊：“中国人坏蛋！”明斯克电视台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造成极大影响。

“道穷”之后

前两年，中国新闻界搞了一个影响颇大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发人深省的却是这个获得“尚方宝剑”的活动刚开始不久，在天津就出了一只“六耳猕猴”。

199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天津一公司假冒“质量万里行”向企业索要赞助引起强烈不满。

原来，天津某公司在策划“中国质量万里行——再延伸”活动期间，擅自拟定强制性收费文件，向企业索取赞助的认证费、广告费，引起企业强烈不满。

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曾婉拒这次

活动。不久，就有人找上门自称是组委会调查主任，提出要检查企业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并质问，你们对政府组织的活动是什么态度？企业只好答应赞助。

为此，新华社8月20日播发了“中国质量万里行”办公室的公告。但天津装饰广告公司仍继续打着这一旗号进行一系列活动……

这一事件倒提醒了我们，中国人对假祸实在不应该陌生，比如这“假传圣旨”，而稍知历史的也应该清楚世事往往如此，“道穷”则法繁。

三国时，诸葛亮用刑峻急，有人疑之。他说：“乱世用重刑”，“刑”即“法”之体也。其实，历史上没几个政治家会对人性抱有幻想，问题是随着第一轮“乱世”到来而到来的重刑繁法，恰因其乱，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谁也不会当真的神话。

1994年，一个叫费伊的美国少年在新加坡因损毁公共财物环境罪，被新加坡司法机构判罪并处以鞭刑，在他屁股上抽了四鞭子。

这一事件被世界各国传媒尽情渲染做足文章，但不论这些文章如何离奇，新闻的主体都非常鲜明：一是美国顽童犯法者费伊，一是新加坡的法律，而不是许多很想出奇制胜爆料这一事件的新闻机构。另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新加坡拒绝任何人从轻发落费伊的请求，世界上最清洁的新加坡是重刑造就的，也

只能用重刑（相对于所犯罪行而言）来维持。

由此可见《经济参考报》（1993年10月21日）发表《“质量行”也要讲质量》这类反思性文章的必然性：

前不久，随着“93质量万里行”人员的到来，位于扬子江畔的一座古城节日般地热闹起来，市中心广场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百盆鲜花，10只彩色大气球在空中飘荡，主要街道上多处悬挂着欢迎的横幅……

然而，仅仅两天，“质量行”离去，打假的声音也陡然沉寂。特别使众多消费者失望的是，由于有公安人员的保护和摄像，摄影人员的阻隔，他们在“质量行”人员到达广场上等候多时，也很难接近“质量行”人员，更难当面投诉了。这个市有影响的两家报纸发表低调评论说，“质量行”时间有限，本应是“上帝”的消费者，却把“质量行”当作“上帝”，这不发人深省吗？！另一报纸评论更直率，不要把“质量行”当作大救星，且不说它无法“天天行”，而且有的采访浅尝辄止，即使是真正查访也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领域的质量问题。

这不但说明新闻的社会功能的局限性，而且证明新闻自身的社会职能和功能的发挥也需要法律作保证。

显然，在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的质量问题上，新闻界管得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但问题却是新闻

界在许多相关事件的报道中何以给人“喧宾夺主”的印象？真正的主角、法律尊严的直接体现和维护者为何远不如新闻界那么活跃？还有，目击那些假祸制造者满不在乎地面对镜头，强词夺理坦然陈词甚至比采访者还要挥洒自如的画面，观众会作何感想？如果我们的新闻有朝一日能像在鞭打美国顽童费伊的屁股时那样，成为国法如山的热情配角，那才是国民之幸。

1990年9月24日《中国消费者报》登了一篇题为《陕西全面扫假治劣成效显著》的文章，不妨摘录一段：

陕西自《关于禁止生产经销伪劣商品的通告》发布以来4个月中，全省各地共查处伪劣商品498.6万件，罚款46.44万元，极大震慑了不法经营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企业质量意识的增强。……

绝大多数地、市、县闻风而动，建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查处伪劣商品办公室，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工具宣传《通告》精神。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张贴《通告》46194张，出动6700多人，受检商品总数达900多万件，其中不合格产品达59%。7289个单位受到处罚，126个经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有心的读者很容易从这则新闻中发现一个问题：近500万件伪劣产品，罚款额不到50万，精确计算是平均每件罚0.0931元。这不是在开玩笑吗？这如何能“极大震慑”

不法经营者？成效又从何而来？

历史已经证明“以政代法”行不通，新闻界作为反映客观事实、对社会各方面起着监督作用的机构，虽然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却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致使人们生出“开玩笑”的感觉，并对扼制凶恶的假祸狂潮从根本上丧失信心。

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不必无所不能，但他至少应该做到爱因斯坦所说过的：“如果用逻辑的语言来描述所见所闻的身心感受，那么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科学。”

暴利，假祸的根源及对策

1994年以来，“反暴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过，暴利作为一种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未必突出表现在高消费场所。因为无论豪华酒家，高档夜总会，还是高尔夫一类的俱乐部，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一杯X.O不论卖上千元，还是上万元，被宰者通常不外是两种人：“大款阶层”和公款消费者。

前者不用置评，而后者若构成严重后果，也绝非所谓“暴利”的问题。

其实假冒伪劣产品不但是最早的一种暴利行为，也是使公众普遍深受其害又最难对付的一种隐性暴力。这种暴利的获得来自于它的最大特点：即暴力的零星却普遍的使用，是建立在对广大消费者利益隐蔽而普遍蚕食的基础之上的。

新闻界这些年一直苦口婆心地呼唤消费者成熟起来。但问题是，有几人能鉴别“天然矿泉水”与自来水的区别？哪个农民有能力有手段鉴别假化肥或有效成分的含量？又有几个消费者能真正鉴别真假羊绒衫或羊绒百分比？即使是名医，是否有精力有时间有条件去鉴别药物真假？甚至连最现代的防伪技术本身都能被仿冒，普通消费者又如何对付得了？！……

商品社会是一个人类生活已经变得无比复杂的社会，在专业范围之外的领域，任何人都可能是个一无所知的“白痴”，而暴力的零星使用则使许多人上当后浑然不觉，即使知道了也只能徒唤奈何。

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不能从法规和手段上同时强化行业管理，建立具有极大独立性的跨地域的高效专业化行业管理队伍，无论有多少次轰动的宣传效果都是枉然。

早有不少新闻工作者在关注这个问题。有一报道说，甚至连国家工商总局的官员去假冒猖獗的广东办案也胆战心惊。这则报道还引述道：“一位专门研究过假冒问题的人士颇有把握地说：假冒高潮还没有到来。”

无须定量分析何谓“高潮”，已有的假祸足以使人清醒，若没有一道坚固有效的拦截假祸狂潮的堤坝，整个社会空气就会被到处弥漫的不信任感毒化，因而变得难以置信的可怕。

可怕归可怕，既然别无选择就必须下定决心与之一战。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歌，牧师生产传道，教授生产教科书等等……犯人不单是生产犯罪，而且也生产刑法，从而产生讲授刑法的教授……假如没有假钞票，钞票之制造会有如此精美吗？假如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会在普通商业部门中应用吗？”

（摘自《海上文坛》）

洋货市场占有率过高

据统计，目前国外生产的摄录一体机和传真机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其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9%和98%。市场占有率在50%至80%的国外机电产品有：移动电话机（80%），大中小型计算机（75%），轿车（70%），电子元件（70%），机床（63%），微型计算机（60%），录像机（60%），数字程控交换机（5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机床消费大国，消费量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近年来在机床消费量日益增长的同时，国产机床的市场占有率却逐年下降，1991年为67%，1992年为60%，1993年为44%，1994年上半年仅为37%。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机床进口国。

（摘自《南方周末》）

“外保”频叩中国大门

阡 陌

中国保险业自改革开放以来,15年间从无到有,发展令人瞩目,保险费收入较恢复之初的1980年增长200倍。然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发达程度的主要指标:保险密度(人均保费额)不足5美元、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NP)为1%,以及寿险比例、险种数量,排在世界队尾。同发达国家“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险体系相比,中国保险领域还像“一片处女地”,令全球保险界巨头们垂涎三尺。这不,继外资银行“策马”中国市场后,海外保险公司在中国掀起了第二波“金融热”。

美日捷足先登 港台不甘示弱

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尽管保险业是中国经济领域最后对外开放的行业之一,但其潜力令人不可小觑。估计在2000年前,中国保险业的总收入将突破2000亿元,且保险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每年将以10%的速度持续扩大。1994年中国所有的保险公司业务总收入仅有500亿元,换言之,还有近8成保险市场尚待分割。无怪乎,声名鹊起的中

国保险市场引起了世界保险业大亨们密切关注,争先恐后抢滩登陆。

1994年初,中国初步承诺,在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允许外资保险公司经营部分以外币结算的保险业务。据统计,1993年6月底,海外保险公司在国内设立了21家代表处。一年之后,代表处已达66家,其中美国友邦保险(AIG)、日本海上保险(Tokyo Marine)、英国Segwick Chartered三家保险公司正式落户中国。友邦保险成为上海首家开展营利性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美国摩根银行则斥资6000多万美元,参股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不久前,世界最大的英国保诚集团宣布正式在北京、上海及广州开设三间办事处。荷兰国际集团也不甘示弱,该集团去年获准在上海、北京设立办事处后,最近又递交了在广州设立办事处的申请,如果获准,下一步还计划在大连、沈阳、成都等设立办事处。

虽然欧、美、日保险业者捷足先登,但据业内人士透露,对中国大陆保险市场最感兴趣的还是港台保险业者。由香港首富李嘉诚投资的“加怡保险”,准备入股首都钢铁

厂，挥师进军大陆保险市场；香港另一大保险业者——国卫保险公司也决定在上海、广州两地进行投资，积极拓展中国的保险业务。而台湾“财政部”拟订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允许岛内保险业者依照间接原则从事大陆的再保险业务。台湾的美商安泰人寿公司副总经理陈扬明说，近年来，在各大保险公司的强攻下，台湾保险市场渐趋饱和，因此利用台湾保险业的有力资源，开拓大陆再保险市场，已是各大公司的主要发展策略。

上海，作为第一个向外资保险公司开放的试点城市，成了今天中外保险巨头的必争之地。被国内保险业同行称之为“大哥大”的人保上海分公司，仅1994年就接待了18个国家和地区近70批410人次外国及港澳台的保险社团。目前，在沪设立办事处的国外保险公司有13家。除了美国友邦、日本海上两家公司正大展宏图外，加拿大的“宏利”人寿保险、英国的“鹰星”人寿保险公司，还有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的保险公司也虎视眈眈，意欲分一杯羹。

据悉，广州即将成为第二个对外开放保险市场的城市。在此之前，已有4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广州开设办事处，在采集信息、调研、联络，尤其在高层公关方面狠下功夫。目的只有一个：快点拿到进入中国市场的钥匙（保险营业许可证）。1995

年广州准备争取两家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据了解，目前对广州保险市场最感兴趣的是美国、日本、香港、荷兰等地的业者，他们纷纷派遣人员到广州考察投资环境，亟欲插队落户。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保险公司办事处打擦边球，迫不及待地悄悄开展保险业务或经纪业务，这种违规做法在国内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香港一些保险公司更得毗邻深圳的地利之便，一些经纪人早晨跨过罗湖桥，晚上便揣着保单回去向老板交帐，眼睁睁地从池里取走一瓢肥水。

营销方式大冲撞 逐鹿险市交战酣

业内人士指出，进军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凭借丰富的业务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较高的专业水准、全新的保险观念，给中国的同行展示着一种崭新的国际保险天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

外保公司都拥有一套独特完整的保险商品，如终身寿险、意外险、医疗险、定期寿险及附加险等。与国内保险公司热衷于储蓄变种的险种，诸如婚嫁保险、养老保险几个单调险种相比，外保更注重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商业习性，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设计保险商品，提供多样化的险种组合来供消费者选择。